

MAKESI ZHUYI WENXUE
PIPING DE
XINZHONGGUO LUJING

陈荣阳 著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
新中国路径

——以20世纪50—70年代的《红楼梦》研究为例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MAKESI ZHUYI WENXUE
PIPING DE
XINZHONGGUO LUJING

...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
新中国路径**

——以20世纪50—70年代的《红楼梦》研究为例

陈荣阳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中国路径/陈荣阳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15-5583-5

I. ①马…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研究 IV. ①A811.691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673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28 千字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录

绪论	1
一、风景与视角:由“红学”观“马学”	1
二、旧传统与新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两个难题	8
第一章 红学“旧时代”	13
一、新文化中的社会批评派红学	13
二、国学风潮中的考证派“新红学”	24
第二章 时代交替中的新说旧梦	39
一、马克思主义与红楼新说	39
二、俞平伯的新思旧想	44
第三章 明确、实用、理性: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53
一、毛泽东的红楼梦读法	53
二、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史观	56
三、毛泽东的“三位一体”思想	59
四、新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	68
第四章 红学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法	73
一、李希凡、蓝翎的红学文章	73
二、批判文集与文学批评的三个律令	79

第五章 考证：人文学术与实用主义的矛盾·····	94
一、革命要求与“琐碎考证”批判·····	94
二、“红与专”讨论背后的价值学·····	101
三、20 世纪 60 年代的“考证逆流”·····	107
第六章 形象：新文学感性与马克思主义理性的边界·····	112
一、典型共名说：何其芳的坚持·····	112
二、诗人的写作术·····	136
三、告别文学与拒绝自然·····	151
四、诗艺重谈·····	156
五、形象：逃离马克思主义理性·····	165
结语·····	175
参考文献·····	177
附录一 文人蔡元培的心史：《石头记索隐》新谈·····	185
附录二 蹶蹢人与观悲剧——王国维悲剧红学探因·····	195
致谢·····	209

绪论

一、风景与视角：由“红学”观“马学”

作为一部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序列中被归类为“古典文学”的作品，《红楼梦》似乎与“现当代文学”这个范畴判若云泥、相去甚远，围绕着《红楼梦》而形成的“红学”，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天然领域。但是，近百年来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却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近代”、“现代”或“当代”的文学现象，内中贯穿着近百年来每个时期特殊的思想、情感与知识结构。如果说，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论述，其中包括了“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文学史”这个子命题，那么，我们在近百年来时时加以重述的《红楼梦》阅读、研究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彼时代的文学观念史，或者干脆说，也就是一部彼时代的当代史，内中包含了各种丰富的文化心理与权力结构。

正是从近代开始，《红楼梦》研究蔚然成“学”^①，梁启超、黄遵宪、王国维、蔡元培等知识界名家纷纷参与《红楼梦》的阅读、评说。以往的《红楼梦》研究基本属于评点性质，评点家大都以类似于金圣叹评《水浒》、张竹坡评《金瓶梅》

^① “红学”称谓起先出于《红楼梦》爱好者之间的戏言，后来相率为风，成为《红楼梦》研究界较为正式的称呼。此称谓最早的记载有两个，一见李放《八旗画录》引《绘境轩读画记》言：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一见均耀《慈竹居零墨》载：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的形式,紧紧围绕作品的内容来说道,其立言无外乎冷热金针^①、左钗右黛、情书理教诸项,往往类似小说导读。而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随着王朝衰亡之相的不断流露以及“现代”巨兽的逐渐逼近,“世变”(王国维语)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整个知识界的上空,面对着巨大的文化断裂危机,知识界名家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与自身的时代感触及知识梦想相凝合,从而产生出具有强烈时代印迹和个人性格的《红楼梦》解读。眷念古典、未能忘旧的人往往以《红楼梦》为寄托咏怀,在其中读出许多文化没落、世情消亡、个体绝望的信息。哀哀怨怨、恹恹惶惶之文,夹以坎坎坷坷、犹犹豫豫之行,别有一番以生命入文的孤绝滋味。如王国维读出《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中之悲剧”,正在于《红楼梦》中固有的悲剧因素与王朝没落的时代悲氛,以及其知识结构中的叔本华悲观哲学影响、个体生活际遇中的悲情坎坷等因素互相激荡,最终方融合成王国维独特的红楼读法。而这种红楼读法,反过来强化了他的个人悲情与悲观哲学。最终在时代的彷徨失措中,王国维以其纵身一跃,将王朝没落、文化陆沉的时代悲氛推向高潮。

一批人告别旧文化的同时,另一批知识界新秀正在组织一场新文化的再造仪式。对于这一批人而言,古/今、中/西两组矛盾交缠纠结,对现代颂扬却要面对西方现代的蛮横无理,对历史批判却难拒绝古典文化的深幽魅惑,乃至其领袖人物在呐喊几声革命口号后,却纷纷跃入《红楼梦》的渊薮,不管其所述缘由是“白话源头”(周作人)、“科学方法”(胡适)抑或是“社会心理”(陈独秀),古典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成为其解读述说文化梦想的载体,总是事实。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与古典、中国与西方的融合碰撞一直持续不断,所有文化人都在趋新与恋旧两极之间摇摆取舍,《红楼梦》成为恋旧派与趋新派的一致选择,成为他们寄寓文化情绪、述说文化梦想的最佳载体,欲谈新旧文化必谈《红楼梦》,欲谈中西文化必谈《红楼梦》,欲谈个体与时代也必谈《红

① 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撰有《竹坡闲话》、《冷热金针》二文,言“冷热……二字为一部之金钥”,指出书中温秀才、韩伙计乃“温”、“寒”之代称,此二字所隐喻的人情冷暖,是书中的总纲,但是《金瓶梅》“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如果读者不明所以,“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于是,要用自己的评点,“为之递出金针”,让全书主谈“冷热”的主线凸显。此即“冷热金针”。后继《红楼梦》评点家哈斯宝、张新之等皆受张竹坡影响,同持此说以观《红楼梦》。如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总录》:富贵则假可成真,贫贱则真亦成假。富贵是热,热则莫不成真,其真即是假。贫贱是冷,冷则莫不成假。其假中亦有真。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

红楼梦》。20 世纪上半期,《红楼梦》的地位不断上升,从士大夫口头之间的“小说中无上上品”^①,逐渐上升至中国之“绝大著作”,成为中国人必读的第一古典文学名著。众多知识界名人的加入,也使得红学蓬蓬而兴,不仅经常成为学术界争鸣的发源地,而且常年成为报纸杂志上的公众热门话题,“显学”之相,逐渐显露。

20 世纪 50—70 年代,《红楼梦》的被阅读与被研究成为此时期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不仅积极向身边的亲友下属推荐阅读,而且亲自发动了一场《红楼梦》研究领域的思想批判运动。经过这场运动,阅读和研究《红楼梦》都被规范到革命事业的阶级斗争主题旗帜下,种种阅读和研究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一主题来进行。于是,《红楼梦》成为一本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教科书,也成为一本充满了当代价值关注的时代之书——可以说,《红楼梦》成为一部从古代开始创作并在当代不断延伸其意义的超级文学作品。

这个超级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是惊人的。“据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所编的《古籍目录》,自全国解放即一九四九年十月起,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止,这个期间全国公私出版机构所出的《石头记》和《红楼梦》各种版本,除其中两种印数不详而外,累计印数共为 1371507 部;那两种印数不详的,我们可以参照类似情况,有根据地估计为六十多万部,与上数相加共为两百万部。”^②不仅如此,《红楼梦》还被改编为各类戏曲,出现了京剧、越剧、黄梅戏、粤剧等多个版本,这些红楼戏进一步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力。以 1958 年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红楼梦》为例,仅 1958—1962 年,即演出 335 场,观众 616000 多人次,以该剧灌制的唱片发行总数 300 多万^③,剧中的著名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家传户唱,妇孺皆知。

这个时期的《红楼梦》评论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状态。先是在俞平伯批判运动中,从 1954 年 9 月到 1955 年 2 月间,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王昆仑等一大批文学名家纷纷出手,写作了数百篇批判研究文章,仅其中重要的篇章,即编成整整四大册《红楼梦问题讨论集》。随着《红楼梦》阅读活动的不断升温,《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党报上时常出现《红楼梦》评论文章,各类学术、非学术刊物上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也是层出不穷,何其芳、

① 杨恩寿:《词余丛话》,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25 页。

② 舒芜:《红楼梦说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序言。

③ 朱小珍:《“红楼”戏曲演出史稿》,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李希凡、蒋和森等都纷纷出版了红学研究专著。据红学家胡文彬统计,“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79 年 10 月的 30 年间,全国报刊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 1500 多篇,出版研究专著 50 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各种论文集、研究资料 200 多种”^①。胡文彬所说的数据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文革”期间,从中央单位到地方院校、企业机关,相继成立了各种名目的《红楼梦》研究小组或批判小组,刊刻了大量非正式出版物,“如果把各地工农兵大批判组用其他形式(如大字报,批判专栏等)所写的(抄的)‘评红’文章加在一起,将是一个难于统计的天文数字”^②。结果是,《红楼梦》声名大噪,真正达到了街谈巷议、妇孺皆知,而且红学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派”正式定鼎,红学研究也从此成为一门“显学”——尽管后来许多曾经亲历其盛的红学家对 50—70 年代的红学大批判颇多羞赧,也不无怨恨,在提及此段红学的时候往往或含糊其辞或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的是,50—70 年代的大批判的的确确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成就了当今红学界津津乐道的“显学”地位。

本书选择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这个时间段的红学研究和红学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因为这一段的红学研究和红学事件云蒸霞蔚、急如密雨,各种文化心理与权力结构都猬集于此,而各方力量的聚合又产生了非常丰富的变化,或者潜流暗涌,或者潮头鏖鸣,显现了良好的解读空间。

目前,关于红学研究的学术史论著,已经有不少,专著类有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韩进廉《红学史稿》、刘梦溪《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潘重规《红学六十年》、陈维昭《红学通史》、李广柏《红学史》、车瑞《二十世纪红学批评史论》等,单篇论文则有胡文彬《〈红楼梦〉研究三十年》(《学习与探索》1980 年第 2 期)、刘梦溪《红学三十年》(《文艺研究》1980 年第 3 期)、赵建忠《新中国红学研究六十年》(《河北学刊》2009 年第 1 期)等。但是以上这些研究论著基本都是比较传统的红学史研究,其关注的问题是,《红楼梦》的版本考证在哪个时代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某位红学家的《红楼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与特色,较有深度的章节也只是粗略归纳一下《红楼梦》研究在某个时代具有哪些基本共性与特点。这样的学术史叙述明显无法深入具体历史语境中去考察《红楼梦》的阅读与研究

① 胡文彬:《〈红楼梦〉研究三十年》,载《学习与探索》1980 年第 2 期。

② 胡邦炜:《红楼祭——20 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 页。

盛况,也无法深入解析《红楼梦》与个体经验、社会思潮、权力结构之间的各种纠缠杂错关系。

非通史类的红学论著中,较有特色的是陈维昭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该书大胆打破了通史类严格以时间为序的写作方法,全书分为“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红楼梦》考证与科学方法”、“社会—文化的诠释维度”、“审美之维”、“主题价值学诠释”五个部分,在20世纪各种学术思潮的背景下来考察红学与各种思潮之间的呼应扭转。该书的缺憾在于,以一个个学术思潮来总体归纳各个时期或者某几类红学研究的思想背景,固然大开大阖、畅爽淋漓,却未免失之于宽,缺乏更精细的观照。以某种下定义的方式来谈社会“思潮”,进而以某种表现抢眼的“思潮”来概括一个时代的特征,丢失掉的,往往是“思潮”背后更为复杂也更具张力的部分。只是谈论红学与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呼应,就可能忽略掉与“思潮”相互搏斗的个体经验,以及“思潮”之下更为丰富的历史留存、接受差异、权力斗争等内容。

孙玉明的《红学:1954》以断代史的方式,从1954年的红学风波入手,细细剖析这场风波中各方的心理及反应,是关于50—70年代红学的研究论著中较为知名的。但是,《红学:1954》存在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过多耽迷于历史事件的讲述。作者在写作准备过程中,搜集了关于俞平伯红学风波的大量资料,于是在本书中,资料成为一个亮点,也成为一种束缚。1954年这场风波中的参与者,无论是毛泽东、李希凡、俞平伯,还是周汝昌、顾颉刚、文怀沙,在“主流思潮”的背景中,其思想指向与态度表达都是比较明确的,作者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或者就事论人,显然无法看出太多的新意,也难以发现更多独特的“风景”。陈辉的《〈红楼梦〉的当代命运》一书,与此类似。

胡邦炜的《红楼祭——20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一书,是另外一种红学论著典型。该书侧重讲述与《红楼梦》有关的各种文化事件,注意到了《红楼梦》在各个时期的政治风潮中成为知识分子精神避难所的现象。但作者是那种带有浓重“纯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与文学之间的权力架构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所以,该书中除去作者表达的愤慨之外,其实并没有对文学与历史、个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更深入的探讨。例如对1954年的红学批判运动,作者如此评价:“这场批判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由于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这两个虽有联系但毕竟有本质区别的问题强行挂钩、混为一谈,从此便似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在学术争论的掩盖下,实际上进行政治斗争。……这也许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

现象吧？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为《红楼梦》感到悲哀！”^①针对 50—70 年代江青、姚文元等人的红学评论，作者引用了鲁迅那段著名的话“谁是作者和续作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然后评价道，“鲁迅不曾活到 1966 年以后，如果他能活到那以后，他一定会提起笔来在上面这段名言后面添上‘野心家看见阴谋诡计’或‘阴谋家看见权力斗争’之类的句子”。作者认为，“文革”期间的评红文章除了阴谋与斗争之外一无所有，如果说这些文章在当下依旧有点研究价值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窥见到那个特殊的时代才可能具有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而且也可以从中发现在一种极权的政治条件下，学术研究沦为奴婢甚至是娼妓的可悲可耻的处境”。^②杜景华的《红学风雨》与胡邦炜的写作意图或者说价值视角类似，同样认为红学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失去学术品格，完全成为‘阴谋政治’的工具”^③——而这一点，基本也就是二者对于这个阶段红学的基本研究层面。

总体来说，50—70 年代出现的《红楼梦》阅读与批评热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代文化案例，但是，目前对于这个案例，学术界却缺乏具有深度的研究。“岂有奇书能避世”^④，这是何其芳的一句诗。本来何其芳用这一句诗，是对自己早期诗歌那种不问世事、一心唯美的趋向表示质疑，但在笔者看来，这句诗恰足以形容新中国成立后 50—70 年代《红楼梦》的命运：《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本空前绝后的“奇书”，对它的各种研究各种解读，都不可能避开 50—70 年代特殊的政治与文化。《红楼梦》深刻地参与了 50—70 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对《红楼梦》的各种解读，成为这个时期各路人等参与现实、想象未来的方式。所以，如果只是站在当下的审美心理和价值立场上来反视 50—70 年代的《红楼梦》研究，对之作以简单的道德评价和对错选择，就根本难以解释那个时代为何《红楼梦》会被那样解读，也无法看到种种读法之间隐藏的那些

① 胡邦炜：《红楼祭——20 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 页。

② 胡邦炜：《红楼祭——20 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 页。

③ 杜景华：《红学风雨》，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目录。

④ 此为《忆昔》组诗十四首之三（何其芳标注作于 1975 年 6 月 1 日）：海上桃花红似锦，燕都积雪白于银。流连光景不思蜀，惆怅天神犹醉秦。岂有奇书能避世，行看故国竟蒙尘。苦求精致近颓废，绮丽从来不足珍。

盘根错节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心理,甚至连《红楼梦》为何会在 50—70 年代受到那么多关注、产生那么多读法,也难以做出有效的解释。想要更好地理解 50—70 年代《红楼梦》的各种读法,就必须将权力结构、社会心理与个体经验等各个方面统合起来,在几方面力量的互动博弈中去观察、去思考。陈辉说得好,“《红楼梦》研究在 1949 年后的中国有其特殊的位置,它犹如一把钥匙,可以解开政治运动的发展轨迹,梳理出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轨迹,解读当代话语权的知识谱系”^①,这是本书谈论红学所采取的基本方法。

当然,如果想要将 50—70 年代的红学研究和红学事件作为解读对象的话,还需要在这个包容了众多话语形式的复杂集合体中寻绎出一个切面或者一条线索,以此提纲挈领,曲径通幽。想要在一本书或者一篇论文里面将包含有一个时代权力结构、社会心理与个体经验等复杂内容的红学事件和红学研究都彻底澄清,条分缕析,其结果更多的可能是盲人摸象或顾此失彼。就如同面对一片骀荡怡人的风景,拍摄者不该有求全责备、囊括万有之想,更为理智的做法是,寻找一个个独特的采景视角,从每个独特的采景视角来辨识、赏玩那一片风景,而最终,从众多视角而认识到的风景断片,水到渠成地聚合成关于这片风景的认识。

由此,本书选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中国路径”作为观察 50—70 年代红学这片风景的采景视角。

红学发展近 200 年来,因为其特殊的文化象征地位,以及近乎无限的阐释空间,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最佳代表。特别是近 100 年来,其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与中国各种文化思潮吸纳吞吐、交融为一,一跃成为时代显学。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则从一种陌生的外来理论,渐次发展成为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流派,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胜利而一家独尊,成为新中国文学批评的唯一法则。由“红学”观“马学”,在诸家批评流派交汇合流、争斗碰击的红学发展历程中观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中国路径,考察其如何面对旧传统与新文学的双重难题,考察其如何超越这两大难题、确立自我并最终在一个时期内成为绝对的文学批评立法,也考察其立法前后与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交缠错节的关系。这是本书所采取的写作方式,这样的方式有利于我们拨云见雾,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缠杂中寻绎一条清晰明了的线索。

^① 陈辉:《〈红楼梦〉的当代命运》,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 页。

二、旧传统与新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两个难题

从正式传入中国开始，马克思主义即与中国文学批评结缘。

虽然在晚清时期已有李提摩太、梁启超等人在其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其论，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较为正式地在中国传播始于十月革命之后。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知识界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成为十月革命后最早系统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之一，他先后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在《新青年》组织了马克思研究专号，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论著。受其影响，《晨报》副刊还发表了一批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1918 年，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虽然他的这篇文章只是在介绍俄罗斯文学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意义，但无疑是中国提出文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联系问题的第一人。

经过李大钊等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和引导，国内各地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20 年，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此后翻译、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成为整个知识界进步人士一时之风尚。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共产党革命活动的正式展开，“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①，其辐射范围已经从知识界上层扩大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到了 30 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现在的人一开口便说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名词；并且时常用这些名词去解释中国原来的社会”^②。“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它比臂的”^③。1930 年，郭沫若出版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该书出版后，出现一阵社会发展史研究的热潮，并进而

①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湾学术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 页。

② 王造时：《中国社会原来如此》，《新月》1930 年第 3 卷第 5、6 期合刊。

③ 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45 期，1935 年 11 月。

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三大论战^①。论战中,各方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大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例如“阶级”、“封建”、“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等,从论战中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②。

20年代末期,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等一批从苏联或日本留学回国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在上海共同发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郁达夫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钱杏邨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各家各派纷纷就如何将文学创作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例如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就明确提出,“文学,与其说它是自我的表现,毋宁说他是生活意志的要求;文学,与其说它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毋宁说他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一切的作品,有它的意志要求;一切的文学,有它的阶级背景”,任何文学都是一定阶级的意志的表达,所以,当前中国的革命文学“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的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这篇文章已经较为明确地使用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并且就其与文学之间的结合有了较为明晰的思路,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作。

但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这场革命文学风潮,最终却演化成为一场文学界的名利、新旧之争。在论战中,各方或者纠缠于个人恩怨,或者斤斤于某个名称口号,或者陷于缺乏理性的对骂,本来志在统一各方力量、共同为革命文学鼓呼的左翼作家联盟,实际上成为各方骂战的战场,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虽然在后来,由于中共中央的直接干预,论争双方握手言和,但是已经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这一时段内,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读文学作品的研究,大都或者泛泛而谈,或者浅尝辄止,并没有太多切实而深刻的理论探讨。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① 第一场论战发生于1929—1934年,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参加者有刘梦云(张闻天)、陶希圣、杜鲁人(何干之)、周佛海、任曙、严灵峰等,分别在《新思潮》、《动力》、《新生命》三个刊物上讨论中国当前到底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郭沫若的著作对后期的论战有影响。第二场论战发生于1932—1933年,讨论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过程等问题。第三场论战发生于1934—1935年,讨论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

^②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湾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论文艺的若干书简》等重要理论文献，都在 1924 年至 1932 年之间才陆续被人发现挖掘出来，直到 1933 年苏联才首次公开集中出版这批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至于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则更是到了 1972 年才首次公开发表。在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苏联文艺界一直流行着一种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没有创立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且根本没有专门研究过艺术问题；除了经典作家可以用作‘例证’的某些片言只语，或者至多只是某些粗略的评语之外，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同美学问题有关的论述；他们关于某些艺术作品、文艺活动家的评论也纯属‘个人爱好’的性质”。^① 因此，这个阶段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是苏联文艺理论家们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苏联官方宣传需要所揣摩出来的。

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马克思文艺理论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基本都是参照苏联和日本理论家的观点所成，他们参照的文本主要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以及一批日本理论家的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所知并不多。依据 1930 年左联出版物《文艺讲座》的介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有影响的苏联理论家，列于首位的是普列汉诺夫，其次有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捷烈夫斯基、佛里契、玛查、阿尔瓦托夫、布哈林等。至于对中国有影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根据《日本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书籍》一文的介绍，主要有平林初之辅、片上伸、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② 因为阶级斗争发展的紧张现实，这些日、苏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如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拉普”派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美国作家辛克莱的“一切的艺术是宣传”等等，大都带有非常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强调文艺服务于斗争、文学批评服务于整体等观念。受其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界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集体主义、实用主义风格。

40 年代的延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汇聚了不少对马克思主义充满热情的文学批评家，如茅盾、周扬、艾思奇、何其芳、林默涵、成仿吾等。一时之间，在延安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热潮，茅盾、周扬等文学批评家，纷纷在报刊上撰文，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来进行文学批评。不过，随着延安文艺座

① 参见[苏]阿普列相：《三十年代对马克思恩格斯美学遗产的研究》，载《哲学研究》1966 年第 9 期。

② 参见艾晓明：《寻找与确立——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概观》，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 年第 2 期。

谈会上,毛泽东将一切文学规定为政治的“螺丝钉”、“传声筒”,批评“关门提高”、“暴露黑暗”,要求服务革命、“歌唱光明”,整个延安文艺界掀起了下乡锻炼、与群众相结合的创作热潮。

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一个具有强烈鲜明的现实功利色彩的理论框架,它突出地强调了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定性,如现实性、政治性、阶级性、工具性、教育性、群众性、政治释义性、宣传性等等,而对于文艺作为一种审美意识的特殊规定性,和文艺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与特点,如情感性、非自觉性、非概念性、本能、直觉、超功利、艺术技巧、艺术形式的巨大意义等等,则明显没有引起应有注意。这样的理论架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只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某些侧面在中国现实文艺生活中的应用、阐释和发挥”^①。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急需对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及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然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从延安时期较为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产生而来的,它面对的是一种较为粗陋、较为简单的生活需要和文化需求,它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并未有过处理复杂文化现象的经验和理论。在这种局面下,之前解放区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自我,需要新的调适、重组、改造、定谳等过程。最为明显的是,它必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上处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古代文学传统、新文学传统两大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只有良好地解决了这两大难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才能最终完成其中国化的进程,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才能完成其中国化的道路。

处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古代文学传统和新文学传统两大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题目。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为例,1932年起,左翼文坛就与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以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进行了一场持续近4年的论争。这场论争中,胡秋原、苏汶一直强调从新文学传统承继而来的“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理念,坚持个人主义的情趣,而左翼文论家则要求文学服从革命需要,让文学作为革命的“传声筒”、在文学中书写阶级内容等。双方寸步不让,展开了激烈的论辩。30年代,左翼文论家还与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实秋发生了“关于文艺的普遍人性和阶级性”的论争,与林语堂发生了关于“表现自我”和“性灵文学”的论争,

^① 代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与朱光潜、沈从文发生了关于文艺与时代关系的论争。这些论争的实质,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新文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直接交锋。40 年代,深受新文学传统恩泽的胡风,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新文学传统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新文学传统之间找到一条黏合的路径。为此,他提出了作家创作的“主观精神”理论,认为作家创作过程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彼此相生相克、化而为一的过程,而介入这交涉过程的包含了作者的思想观念,以及作家的情感、想象和直观等“主观精神”。然而,胡风的这个观点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作为资产阶级唯心思想加以批判。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这段话也可以相应地理解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因此,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整个文学批评界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又如何处理旧传统与新文学两大难题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